弹涂鱼与泥艋船

□靖茗

渔谚有云,“大麦抽穗,晒煞高场弹糊”。每年的夏秋之际,海边滩涂上就爬满了形似泥鳅、又长有两只脚的弹涂鱼。弹涂鱼又称为跳跳鱼,在舟山话里被叫作“弹糊”或者“弹路”。在舟山人的餐桌上,弹涂鱼有多种烧法,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与咸菜卤炖在一起的“乌鱼铭新齑”。弹涂鱼肉质滑嫩,味道鲜甜,富含营养,深得舟山人的喜爱。特别是到了冬令时节,弹涂鱼肉肥腥轻,所以有了“冬天跳鱼赛河鳗”的说法。

康熙年间修订的《定海县志》专门对弹涂鱼的味道有所提及“常在泥中跳跃,故又名跳鱼,味甚美”。清朝郭柏苍海产著作《海错百一录》中详细描述道“跳鱼产咸淡水,大如指,肉细味清,腹有黄子尤胜”。舟山的鱼谚里也有“弹糊黑溜秋,味道赛斑鸠”这一句。民间传说当中更是记载徐福奉皇命东渡,经过舟山群岛时品尝了一道弹涂鱼制作的菜肴后,即被这道风味独特的美食折服,不禁大加赞赏。

弹涂鱼虽然好吃营养,但是并不容易捕捉,这也导致了这种鱼数量繁多却价格偏高。

海边的渔民在滩涂上捕捉弹涂鱼的时候,苦于潮退潮涨,滩涂又泥泞难行,经常发生被困危险。因此,充满智慧的渔民就开始思考能不能借助工具解决这个困难。某日,有渔民坐在条凳灵机一动,将条凳翻倒,一条腿跪在条凳板上,两手紧扶凳子前面两脚间的横档,另一条腿着地后蹬,让凳子划地而行。随即根据这种思路,制作出了滩涂上滑行的交通工具,取名为“泥马”,意为驰骋在滩涂泥泞上的马匹。后来这个研制过程也被演化为神话传说,流传民间。

“泥马”在我国东南沿海分布广泛,经过渔民们根据实际应用世代改进,逐渐改进为前尖后宽,前部向上略翘,尾部比较宽且有开口。前后有隔板,前部留有空位可以放置器物、干粮、引水以及雨具等。大多数的“泥马”最多能装载上百斤的滩涂小海鲜。推动滑行依靠“泥马”的把手,也可以通过把手提着或者背着“泥马”在岸上来回。因此“泥马”这种器具外形类似船舶,一些文献著作规范地称之为“泥艋船”,而东南沿海各地方言叫法不尽相同。

光靠使用“泥艋船”快速滑行捕捉灵活的弹涂鱼还不够。“出生泥涂屯泥屋,跳高跳远本事大,十个将军拘勿牢,翻个跟头呒影踪”这条谜语便能说明弹涂鱼在滩涂上的灵活程度。这也难不倒以海为营生的渔民们,他们摸透了弹涂鱼喜欢钻洞的习性,将“诱敌深入”与“守株待兔”两种方法结合,使用竹管“ 弶弹糊”的独特渔法猎获它。

清代学者俞樾在六横岛目睹了这种捕获弹涂鱼的方法,啧啧称奇,并写入了自己的著作《右台仙馆笔记》一书中,“其捕阑胡(弹涂鱼)之法,先以竹筒千百遍插泥中,乃乘泥鳗(泥艋船)东西驰逐。阑胡(弹涂鱼)遇孔必跃入,则尽入竹筒矣。”舟山民间里有专门“弶弹糊”谜语:“出身深山一丈青,来到宓家分了家,泥水地垟(田地)砌竹屋,黑炭小歪(小男孩)跳进来。”这种拟人化描写可谓幽默巧妙。此外,“弶弹糊”的渔获方法也在民间演化出八仙戏捉弹涂鱼的神话故事,妇孺皆知。

“泥艋船”的妙用不仅仅在于捕猎滩涂上的弹涂鱼等小海鲜,也曾经在古时候作战中起到了不凡的作用。

明朝嘉靖年间,戚继光偶然在滩涂上看到百姓架着“泥艋船”,滑行如飞,便衍生出用“泥艋船”歼敌的妙计。大批受命于戚继光的乡兵划着“泥艋船”,来到倭寇停靠在海边的船舶前呐喊叫骂,引得倭寇追击登陆。倭寇在滩涂上没有工具辅助,寸步难行,只能败下阵来。

“泥艋船”与现存六横岛的“浙东第一功”史迹也有莫大的联系。清朝咸丰年间,洪秀全的太平军其中一支部队攻打舟山,第一站便是六横岛。六横民团拼死反抗。根据俞樾所著《右台仙馆笔记》一书描述:太平军集中兵力从海上追击六横民团。谁料,经过滩涂时,太平军发现滩涂泥泞绵软,“悉陷于淖,一足起,一足又陷”,行动缓慢。六横民团看到后,“乡人皆乘泥鳗(泥艋船)往”,在滩涂上滑行如飞,包围了正在登陆途中的太平军,迫使对方束手就擒。于是,经此一役,六横民团胆子就更大了,多次驾驶“泥鳗(泥艋船)”配合土炮轰击、海钩陷阱击退太平军。太平军吃尽苦头最终也没有攻陷六横岛。因此,当时的清廷官员孙治在六横岛一处岩石上书写了“浙东第一功”表彰这次六横民团为拱卫舟山作出的贡献,至今仍作为史墨,留存在东咀头。

马头墙的美学

□文钧客

传统民居建筑中的封火墙、防火墙,因为该类墙垣形状酷似马头,故被形象地称之为马头墙,是江南古典建筑中的重要特色。高于民居建筑的两山墙屋面的墙垣,随着屋面的坡度层层迭落,以斜坡长度定为若干档,有一、二、三、四阶之分,也可以称之为一、二、三、四叠式,其中以三、四阶比较多见。如展茅的柴家走马楼、沈家门接待禅寺的马头墙均为三阶。建造过程中,工匠常常会在每只垛头顶端安装搏风板(也叫金花板),并制作苏样“座头”,即马头墙的“马头”。

柴家走马楼的“座头”是“鹊尾式”,即雕凿一似喜鹊尾巴的砖做为座头,接待禅寺的马头墙亦如是。此外还有类似定海西大街的建筑为“坐吻式”马头墙,即是由窑烧的构件“吻兽”安在座头上。

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马头墙的墙面一般用白灰粉刷,墙壁的头部覆盖有青色瓷砖和两个屋檐,白墙青瓦,明朗而雅素,属于江南地区传统民居建筑的常见特征。自明清以来,因为深受这徽派与赣派建筑风格的影响,所以马头墙在舟山的乡村传统民居建筑里最为多见。

驻足柴家走马楼的院落中央,方会体悟到马头墙之美。院落四周都是高大封闭的墙体,由于马头墙的设计而显得墙体错落有致,并不静止与呆板。这种高低起伏的马头墙设计更让聚族而居的宅院,在视觉上产生一种“万马奔腾”的动感,隐喻了整个宗族生气勃勃、兴旺发达。对于古时候的人们来说,男子十二三岁就可能背井离乡,经商就读,而马头墙即成为了家人们望远盼归的物化象征。

如果用点、线、面三个角度来剖析马头墙的设计。那么,“面”就是白墙,“线”就是长短不一的黑色墙檐,“点”就是墙面上零星点缀的门、窗等等。点、线在“面”上的灵活构造,消除了人们对纯黑白建筑呆板、分离的视觉疲劳,极大程度赋予了白色墙面的视觉表现力。

马头墙除了美观以外,更为重要的作用是为了防火。传统民居住宅多为木材构成,加之宅院里的房屋联结、密集,一旦发生火灾就会蔓延。修造马头墙就能够起到隔断火源的作用。同时,由于马头墙内一侧如若被大火焚烧后会向里倾倒,墙内沙土和砖块可以起到抑制火势、降低险情的作用。两座马头墙之间的通道也被称为水道,在火宅发生的时候可以方便运输水源。

包括柴家走马楼在内的传统江南建筑里,每座宅院至少会舍有一个天井以上,除了起到通风采光的效应以外,还可以与周围耸立的峻拔马头墙相匹配,形成一个向上的竖直通道。这个通道能让冷热空气对流,在酷热的夏天,通道下方依旧是凉爽无比。值得一提的是,马头墙一般都是空心墙,中间存有大量沙土,因此隔温效果会比一般实心砖要好得多。

到了冬天,高出屋顶数尺的马头墙又能阻挡冬季寒风直接涌入屋内,起到防风防寒的作用。而且传统建筑屋顶一般都铺着体积小、重量轻的青瓦,马头墙也可以为之起到防风吹落的效果。

可以这么说,特别是近几百年来,马头墙是我们江南地区深宅大院的最好象征,如今随着时代更迭,传统民居中马头墙的傲然姿态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随着舟山地区城市花园的建设,马头墙又以新的复古风貌与花卉树丛结合,频频出现在乡村、公园当中,成为了居民津津乐道的复古景观标志。

崎头洋上的那些历史故事

□澹台墨左

崎头洋曾被称为旗头洋、踦头洋,在地理上与峙头洋连横在一起,因此也常被称为峙头洋,属于浙江省东北部海域,南环宁波市北仑区穿山半岛、西起北仑区的穿鼻岛、东至普陀的蚂蚁岛,北面是普陀的马峙岛、鲁家峙,周围的航门水道较多,向北经普沈水道可以进入莲花洋,向东经虾峙门可以进入东海,还可以经六横佛渡横道开往磨盘洋以及象山的大目洋。崎头洋海域较为宽深,因此大风时浪涌也较大。

在历史上,崎头洋作为东部沿海海上要道,曾与很多知名历史事件有所关联,今选择部分以飨读者。

北宋灭亡后,南宋第一任皇帝宋高宗赵构继位的第二年(公元1128年)。来自北方的金朝又继续大举南侵,宋高宗被迫一路南行,一直逃亡到海上。

宋朝建炎四年(公元1129年)正月十六日,金朝军队攻陷明州(今宁波),乘胜追击将定海(今镇海)一举拿下。金朝水军战船开到昌国(今舟山)的时候,得知宋高宗赵构打算逃往温州方向。随即,金朝将军阿里蒲卢浑勒令水军从海上追击宋军船队,却因为水军不擅长在海上作战并且不熟悉水域,没有追上宋高宗。

金军返航经过崎头洋时,恰逢风雨大作。宋朝的和州防御使张公裕抓住时机,忽出奇兵,率领自己的船队对金军迎头痛击。这一战,把阿里蒲卢浑的水军尽数击败,金军只能溃不成军,四散而逃。

在宋金两朝的之前较量中,金军基本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因此大量的宋朝官员、将领都对金军产生了心里阴影,无论是在陆战还是水战中都曾出现过不战而溃的奇怪现象。反观张公裕毫不惧怕金军,他意识到自己的水军战船吨位优于金军,对海上作战也比金军更为熟稔,于是趁着崎头洋大风大浪这个得天独厚的“天时”,抱着必胜信念,一举挫败了金军的锐气。自此,金兀术和阿里蒲卢浑针对宋高宗的“搜山检海”追击战彻底落下了帷幕。南宋朝廷与军队也逐步在浙江一带站稳了脚跟。

张公裕的这一战,后来被《续资治通鉴·宋纪》和清光绪年间《定海厅志》详细记载了下来,史称“明州海战”。

六百多年后,崎头洋上又发生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海战,交战双方是清朝将领李长庚与海盗蔡牵。蔡牵从清朝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下海为寇开始,频繁劫掠闽、浙、粤海面,甚至攻打港口,登岸夺炮,实在猖獗。同时,源于安南(今越南)内乱产生的流寇,与广东地区盗匪凤尾、水澳合谋肆意袭扰沿海地区。

时任福建海坛镇总兵的李长庚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奉命歼灭这两支海上流寇力量,先后在衢港(今岱衢洋)以及普陀多地击溃流寇的船队,战果颇丰。

清朝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李长庚在松门山下重创了安南的流寇船队,俘获了大批流寇。同年,安南臣服清廷,残余的匪患只能投靠海盗蔡牵。蔡牵一次性获得百余艘“乌艚船”和大批船员,实力大增。

浙江巡抚阮元和戴升为浙江提督的李长庚商量,集资“十万余金”在福建建造大型战船,取名为“霆船”,并为这些战船配备四百余门大炮,希望通过实力上的差距碾压蔡牵的船队。这些战船打造完成后,也没有让李长庚失望。他率领的水军连续击败了蔡牵船队多次。根据清朝光绪年间的《定海厅志》记载,李长庚在崎头洋以及距离东极青浜岛东北约两海里的东霍洋上打得蔡牵船队溃不成军,自己的水军也因此“军威大振”。

海盗蔡牵情急之下,与广东海盗朱濆沆瀣一气,对抗李长庚的水军。不幸的是,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十二月,李长庚在追击穷途末路的蔡牵船队时,被炮火击中阵亡。两年后,曾经的部下王得禄、邱良功在台州渔山外洋剿灭了蔡幸及其船队。

相传,李长庚治军严厉,赏罚分明,所管辖的军队从上至下,“耳目心志如一,人人皆可用。”因此,李长庚阵亡后,其部下“勉以同心敌忾”,誓要为他雪仇,最终成功剿灭蔡幸。

崎头洋上也不全是战事,历史上也留存了不少中外交流、贸易的轶事。

明朝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根据祝允明所著的《前闻记》记载,明朝郑和使团第七次下西洋。两年后(公元1433年)的二月十八日,船队顺利返回,途中穿过象山港,自西南向东北方向航行,六月十四日抵达崎头洋。继续向北航行,一个星期后到达江苏太仓,完成使命。这一次出使西洋,郑和及船队共计二万七千多人,先后前往了位于西洋的二十多个国家及在东南亚设置的旧港宣慰司,最远触及非洲南端(接近莫桑比克海峡),对外建立了进一步的外交关系。

同样是中外交流贸易,与明朝以及清朝早期的开放相反,乾隆年间的海禁政策较为严苛。乾隆轻视海上贸易,更为注重农商,为了巩固海防,自清朝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开始,关闭其他地区的贸易港口,仅留下宁波、广州两地作为中外通商口岸。四年后(公元1755年),乾隆又下诏加重宁波港赋税,而且要求所有洋行及海外商人都只许在广州靠泊上岸,史称“一口通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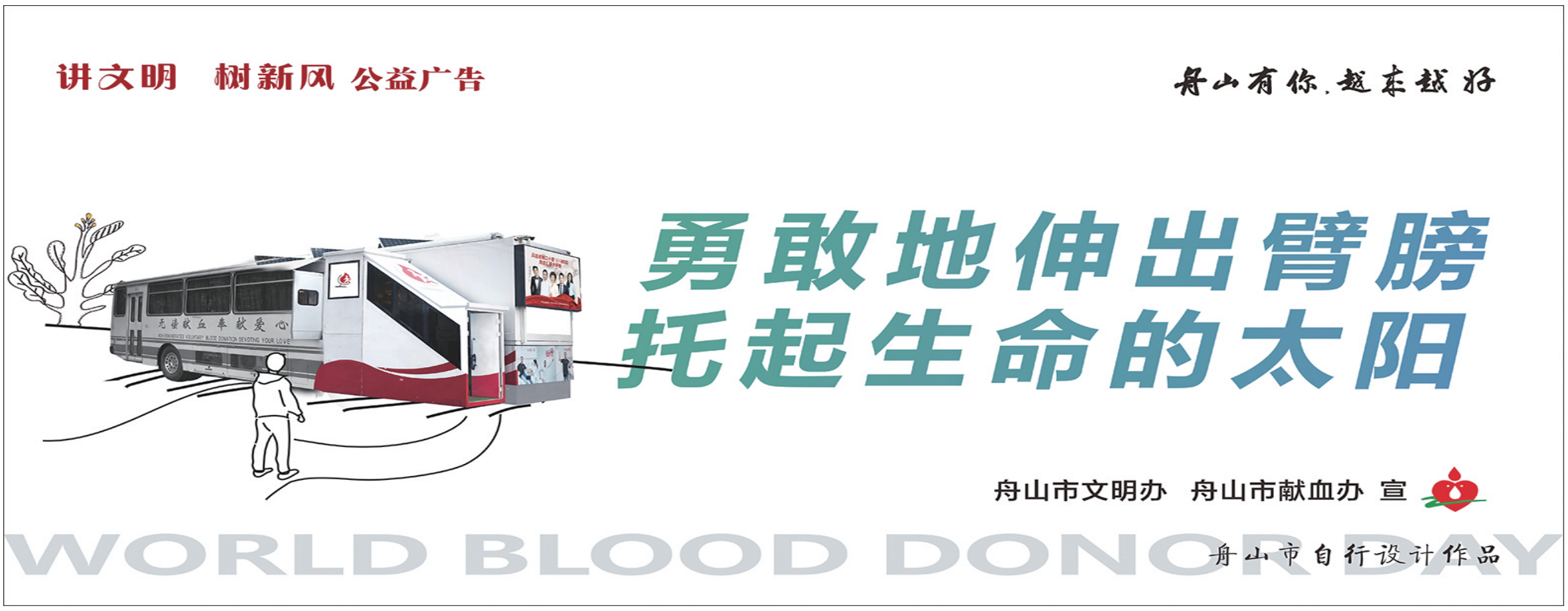
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不知情的英国一艘商船抵达崎头洋后被告知“不准一船入浙”,即所有船舶不得停靠宁波港,只能前往广州。而宁波港也更是在第二年被撤销,同年,设立达六十年之久的定海“红毛馆”也被要求废置。值得一提的是,这座“红毛馆”又称“西洋楼”,由监督张圣诏提议设立于康熙年间,具备外国商船业务办理、收缴关税等作用。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宁波港在这次废置后,竟在二次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通商。

如今的崎头洋上,风平浪静,大小船舶星罗棋布、往来频繁,好不热闹。而生活在这里的我们,也需要“以史为鉴”,不忘历史点滴,踏实走好未来的路。

文史天地

主办

区政协文史与学习委



本报地址:普陀区东港海印路426号 问询电话:0580-3805576 3817400 邮政编码:316100 广告招商热线:13506600070 印刷:舟山海印印业有限公司 本报法律顾问:浙江星岛律师事务所 徐舟波律师